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ird Roxbury Ed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德]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 著 [美] 斯蒂芬·卡尔伯格 (Stephen Kalberg) / 英译

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秦明端 / 中译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ird Roxbury Edition)

〔德〕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 著

〔美〕斯蒂芬·卡尔伯格 (Stephen Kalberg) / 英译

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秦明瑞 / 中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伯里第3版/ (德) 韦伯  
(Weber, M.) 著; (美) 卡尔伯格 (Kalberg, S.) 英译; 苏  
国勋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 - 7 - 5097 - 1658 - 8

I. ①新… II. ①韦… ②卡… ③苏… III. ①新教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B97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790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著 者 / 马克斯·韦伯  
英 译 / 斯蒂芬·卡尔伯格  
中 译 / 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秦明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mailto: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董根兴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字数 / 42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658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073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在将近 70 年的时间里，韦伯那具有无穷影响力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有了一个新版英译本，译者卡尔伯格是世界知名的韦伯研究专家。在第三版英译本中，卡尔伯格尽可能地保留了韦伯的写作风格，并给出了他自己的精密描述和因果推断。卡尔伯格对韦伯作品中的词汇进行了标准化，从而促进了人们对韦伯作品的理解。韦伯原著中的斜体、重大主题的强调都得到了保留。简言之，这部著作的清晰和可读性强的风格得到了再现。

有三点原因值得人们去阅读这一经典：

- 探讨了西方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以及遗产的持续争论。
- 帮助读者很好的理解今日世界经济，尤其是俄罗斯、东欧、亚洲和南美的发展。
- 深入探索了影响当代美国以及欧洲工作生活和工厂场所的文化动力。

对于学生而言，这本书是理解社会变迁多维度的起点。关于现代生活诸多主要元素的持续争论很多都源于韦伯的主题，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理性选择的常识、文化驱动力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张力、民主的文化基础、经济文化和商业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的命运。



卡尔伯格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部他们将会发现是无价之宝的译著。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新译本与韦伯其他密切相关的著作放在一起，同时配上一份详细和通俗的导言以及韦伯这个人、这本书和这本书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位置的背景信息，这是一个多棒的主意！卡尔伯格的全面导读，信息丰富且具有学术性，同时也是对这本书的一个清晰和易懂的引导。这份导读为韦伯这一重要而富有影响的——也常常被误读的——论题提供了精确细致的说明，将它放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韦伯自身关于社会学的总体理解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新版本，是对之前译本的极大完善，也将清除之前译本或许已经制造的对韦伯思想的种种误解。

Wes Sharrock, 曼彻斯特大学

韦伯的《新教伦理》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这个新译文是受人欢迎和值得花费精力去做的一项事业。它小心谨慎地表达了韦伯文本中许多重要的细微涵义，给出了他的文本在所处时代的思想架构中的清晰观念。卡尔伯格教授的导论对韦伯的这个文本做出了引人入胜的评论，指出了他的著作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核心问题的相关性。这部著作是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学习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史的大学生们的工具。

S. N. Eisenstadt,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 中文新译本序言

苏国勋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的中文新译本，是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卡尔伯格 2002 年新版英文译本并参照德文原文翻译的。《新教伦理》德文初版于 1904 ~ 1905 年问世，修订版于 1920 年刊行，由帕森斯翻译的英译本于 1930 年出版，根据这个英译本由于晓、陈维刚等翻译的该书的中文全译本于 1987 年出版，此后 2007 年又有台湾学者康乐、简惠美同样根据帕氏英译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既然已有两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在先，何必再重做一个新译本于后呢？或者说，这个中文新译本有什么必要性呢？

简单说来，主要是由于不同中译本所根据的两个英译本具有不同特点，可以扩展读者的视野，兼收并蓄地从不同方面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帕氏的英译本对韦伯思想传播到国际学术界可说居功至伟，多次在美国被再版重印并被转译成不同文字在各国流传。然而帕氏译本的目的主要是为学术研究，阅读对象是针对谙熟西方文科经典的专业学者和在校大学生，而卡尔伯格的译本是针对身处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读者，他们囿于时代和条件的变迁而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史的兴衰过程无暇深入探寻，为此卡氏译文在力求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力照顾到可读性和便于理解性，不仅对原著内容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学术概念、术语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文化典故给出了解读，还对韦伯行文中简略提及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地点做出了校勘和说明。这部分内容连同长篇导论使卡氏译本比帕氏译本多出近十万中文字的含量，

这新增加的部分对身处不同文明的中文读者加深对西方文化、宗教沿革的了解和对原著精髓的理解可能弥足珍贵，这也是我们花费精力重译本书的一个原因。

再者，对古典大家作品的移译，本身就是一种再理解、再诠释。同样，阅读不同的译文，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和鉴别，可以提高对经典文本深邃意义的理解。中国文论常说：诗无达诂，意思接近于人文学科深邃涵义关乎个人生命体验具有独一无二性，几近不可传译，或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里对此不做方法论上的探讨，只想对韦伯文本的理解提供另外更多一些参考，以摆脱对帕氏一家之见的路径依赖。这里仅举一例。譬如，帕森斯将韦伯使用的德文 *stahlhartes Gehäuse* 译为 iron cage（铁笼），这个用语在整个人文学界已经获得了广泛传播，成为批判理论揭示理性化未来发展面临作茧自缚式的困境的一个概念。而卡尔伯格将其译成“钢铁般坚硬的外壳”（steel-hard casing），意在唤起人们警醒一种即将要出现的黯淡前景。Cage（笼、牢笼）意味着巨大的刚性，没有像 casing（外壳）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具有太强的限制性，甚至可能会被剥落，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偶在性，而不是刚性的规律性、必然性或者线性进步史观所强调的单义的决定性。一个概念两种细微含义上的差别，表达了对韦伯原著精神——以理性化为表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和鉴别读者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提高对原著的理解。除了这些数量众多的尾注以外，卡氏还为本书撰写了一个长篇导论，深入浅出地诠释了韦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社会现象生成和存在的复杂性和多元因果性，并将韦伯推理的精致入微、错综交叉与其论证的因果链条之纹理清晰两方面紧密地交织展现在读者面前，为现代读者深入理解韦伯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导引。正如当代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 S. N. 艾森斯塔德对卡氏译本评论时写道的：“韦伯的《新教伦理》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这个新译文是受人欢迎的和值得花费精力去做的一项事业。它小心谨慎地表达了韦伯文本中许多重要的细微涵义，给出了他的文本在所处时代的思想架构中的清晰观念。卡尔伯格教授的导论对韦伯的这个文本做出了引人入胜的评论，指出了他的著作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核心问题的相关性。这部著作是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学习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史的大学生们们的工具。”（见本书扉页）

## 二

韦伯的《新教伦理》一书出版迄今已近一个世纪，它是20世纪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中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方兴未艾之际，《新教伦理》中文全译本于1987年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仔细琢磨，二者之间确乎存在某种联系。韦伯的这部著作主要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起源，以及宗教伦理与经济行动之间的关系，其内容与当时中国社会开放和经济改革以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势确有某些关联，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从80年代前后不断召开的诸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可见一斑。在《新教伦理》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中加尔文宗的理性化程度和理性化过程，阐明了加尔文宗的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指出加尔文宗的教义学和神学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并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建立起一套宗教观念与特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与其说受韦伯这一论述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的影响，80年代的学术界许多人都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思想去解读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问题，其中有人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也有人将“儒家文化”作为“新教伦理”的替代物，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时把儒家传统对“四小龙”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佛教对东南亚的关系；还有人把韦伯论述的源于西欧启蒙运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展至西方以外，譬如日本，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赞成者抑或反对者，都使亚洲地区围绕东亚经济腾飞而展开的文化讨论，与对《新教伦理》的研究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一波的研讨既推动了韦伯著作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客观上也对80年代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新教伦理》中，韦伯首先从19世纪欧洲社会统计资料的经验现象入手，探寻新教徒在社会分层上为什么比天主教徒占据较为优越位置的原因，尝试分析宗教观念对思想和行动方式的影响。他发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德文时把“职业”译成“天职”（*Beruf*），由此造成新教徒以上帝的召唤（*Calling*）为职业的“天职”（*Vocation*）观念，引出新教徒视世俗职业为“天职”的入世理性主义生活态度；“天职观”

对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宗发生了重要影响：勤勉于世俗职业，刻苦劳作，节俭生活，精于计算，自制禁欲，立志要成为职业人，包括把各种活动特别是职业活动整合为一体，成为一种讲究方法的（methodical，基督新教的一个宗派亦称循道宗 [Methodist]，即由此得名；本书有些地方又译为“有条理的”）系统生活方式的倾向，这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人格特征。此外，加尔文宗的“预定论”（Idea of Predestination）的教义表明，在信众中谁被上帝拣选获得拯救（to be chosen for salvation）都是上帝的预先决定，一切自然的有机关系（如血缘、地缘、业缘等一切人际关系）都无从依靠。这一信仰造成新教徒在争取个人救赎的过程中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每个人注定在救赎路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孤独地踽踽前行，导致新教徒养成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观念以及冷漠的处世态度。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拣选预定得救的人，个人就必须在世俗职业中做出超乎常人的骄人业绩，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即“选民”（the chosen people）。由此世代相传，就形成了以新教伦理为驱动力（也是表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加上其他制度性因素的配合，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此后，韦伯还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为总标题陆续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等著作，与新教研究做对比，从反面论证何以现代资本主义不能首先发生在东方。这种以考察世界主要宗教为代表的世界主要文明的比较研究，着重解释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观念和心理因素，被称为文化论进路。

单看上面的论述，读者可能会认为韦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观念论者或唯心论者，亦即文化决定论者，其实不然。韦伯多次阐明，文化因素只有在物质或制度因素的配合下才会对人的社会行动发挥作用。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的，除了以“新教伦理”所蕴涵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些观念、文化因素之外，还须有其他一些物质和制度性因素的配合。在《一般经济史》（也译作《世界经济通史》）中，他把这些物质和制度性因素归纳为：①市场的自由交易；②发达的货币经济；③劳动力的商品化；④理性技术的运用；⑤经营组织与家产的相互分离；⑥正确描述借方和贷方关系的复式簿记（记账）制度的应用；⑦形式法律制度的保障；⑧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等。这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集生产、消费和分配于一体的体系，是一种融合了特定精神和物质条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种观点是一种与文化论相对的制度论进路。

历来学术界对韦伯的解读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古犹太教、儒教、印度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性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包括《一般经济史》）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从整体来看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括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斥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即所谓的“嵌入”（embeddedness）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换言之，依靠勤勉刻苦、自制禁欲，利用健全的簿记方法和精心计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合法地获取预期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韦伯称之为“经济伦理”。这种合理性观念还传播应用到社会的其他领域，譬如法律中的形式主义、社会管理中的官僚制化等，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理性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 三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是对当代几种世界宗教所代表的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与涂尔干对原始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并列，古今比肩，相映成

辉，一起为宗教社会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宗教社会学是社会学的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哲学、神学等理论学科（所谓形而上谓之道）不同。譬如神学是一种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它是根据信仰来判断一种宗教历史成果的有效性，使用的是一种严格的神学范畴，即来源于独特的神的启示（譬如基督神学）。而宗教社会学则属于一门经验的社会科学（形而下谓之器）；它不涉及宗教的本质问题以及不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做出孰优孰劣、正确与谬误之类的价值判断，只研究某种宗教行动（信仰）的条件和后果。换言之，某一特定宗教信仰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以及它对教徒的社会行动产生什么影响，才是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使在最后的研究结果中做出评判，也端视它对社会整合、经济成长的作用（function）如何做出评价，故功能分析是社会学、人类学中长盛不衰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具有“价值中立性”（value neutrality），即只研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宗教信仰，而暂不对这种宗教信仰进行主观的伦理评价，正如在司法领域未经法律审判之前的“无罪推定”概念一样。这也是在宗教信仰领域引入宗教社会学一类学科受到颇多非议、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究其原委，不外乎对社会科学“价值中立性”的误读；进而言之，对现代社会给传统神学带来的巨大冲击认识不足、因应乏力。譬如，被自由主义奉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圭臬的事实/价值二分原则，遭到保守主义神学（如福音派）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从启示的绝对性出发指责这一二分法是导致现代社会相对主义盛行、虚无主义泛滥的根源，并试图以前现代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文化总体性（totality）来阻挡现代科学的分蘖，而完全无视自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解体以来，近代实验科学从哲学中纷纷独立、经验科学的分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合理性。

其实，再没有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比“价值中立性”饱受更多误解的了。“价值中立性”出自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是“价值关联性”（value relevance）概念，这两个概念是韦伯“理解的社会学”内在逻辑和张力的表现。他试图把自然科学强调的因果说明和德国的精神科学（狄尔泰、李凯尔特等）所主张的理解意义同时纳入社会学，亦即从理解个人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入手达到对整体社会的因果说明，这就是他的“理解社会学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原因。韦伯用“价值关联性”拒斥 19 世纪后期欧洲社会学中主张社会科学只关注事实而不涉及价值的实

证主义思潮，但保留了科学必须对现象做出因果性探究的理性原则；同时又用“价值中立性”反对德国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把经济学视为伦理科学、抹杀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主观主义的偏颇，却保留了价值判断是认识社会现象背后之意义的手段这一解释学原则。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社会科学单纯地沦为一种社会认识的方便工具，强调认识主体对社会客体应负有的伦理责任。

人们知道，要想真正认识一种宗教信仰（行动），只有透过理解信徒主观经验、理念以及个体所关注的目标，即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才能奏效；所谓理解，就是对构成社会现象的行动之意义做出“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故，价值判断在这里已参与了宗教事实这一社会现象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社会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又都是与价值相关的，因而具有“价值关联性”。这是这些学科具有“价值判断”的理据。而“价值中立性”则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事实描述（fact description）性质，属于实然（is）呈现或陈述。它的作用仅限于警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做研究时要恪守工作伦理，讲究职业操守，敬业自律，不能因为社会现象有价值介入就放纵主观偏好，应保持一种“学术上的禁欲态度”（academically asceticism），这属于一种规范性（调适）原则（regulatory principle）。价值判断则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伦理评价，属于应然（ought）断言；它参与社会现象的构成，正如时间—空间范畴参与自然现象的构成一样，故，“价值关联性”是一种构成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由此可见，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在这里把事实区分为现象与物自体，并试图用上述两个概念解决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本文论旨相关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在韦伯的脉络中，价值中立性是与责任伦理相连的，而价值关联性则与信念伦理相通。进一步更深层的意思是，他的题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全部宗教社会学（也是一种世界文化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主题恰恰在于论证基督新教何以是禁欲主义的伦理宗教，及其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韦伯认为，与西方基督教不同，东方宗教例如儒教，则缺少一个人格化、超越性和伦理性的神祇。故，在中国社会的制度层面，现世与彼世（超越界）之间的必要张力迄今尚付阙如。用这种形式的价值中立与其实质的责任伦理关系来刻画基督新教，对韦伯来说，确乎是一个明显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吊诡。可以概括地把它表述如下：西方宗教的禁欲精神对于现世的排斥，表达的却是基督徒对支配现世的渴望和强烈激



情，因为从基督新教徒“入世而不属世”的意图来说，入世的劳作只不过是追求一个超越目标（灵魂得救）之努力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出世而又入世的禁欲者”。他所期望的，只是成为荣耀上帝的工具，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尊严与价值之源泉。既然这是他所向往的，那么就必然体现在行动上——他就成为理性地转化这个世界和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

那么，社会学应该怎样指导一个现代人在世界中的行动呢？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的世界，已不复有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面对多元价值之间的竞争、冲突，一个现代人，应该秉承“责任伦理”的心态，仔细地考量各种因素的作用并权衡利弊得失，充分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可能后果，在心怀道德和追求效率之间寻求葆有张力的平衡，面对当下的情景去果敢地应承挑战。韦伯的“责任伦理”概念是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对实践伦理的批判，转到社会学的经验层面，把研究道德形式的无矛盾性转变为研究道德内容的首尾一贯性。换言之，韦伯极为重视在行动实践中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内在一贯性（inner consistency）：一方面，实践主体基于“自由的人格”能够贯彻其意志之选择；但另一方面则必须基于“存在是什么”（What is）的事实认识审慎地谋划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可能后果；职是之故，责任感愈重，对目的一手段合理性关系的认识就愈充分、愈彻底，就愈益要求在伦理信念与社会行动中表现出严格的首尾一贯性。这就是说，“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或“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并非绝对互相排斥，反而在特别组合下足以成就韦伯心目中的“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参见施鲁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当这个人面对成功的结果时，他没有丝毫的暗自庆幸和得意，也从不窃喜于一得之功；而当失败的结局来临时，这个人仍然能够神情淡定从容地说：即使如此，我也义无反顾。这才是一个“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一个现代的人。

从上述意义上看，对韦伯来说，社会学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存在的知识或者认识体系，不只是为了给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的行动提供了工具；仅限于此，社会学知识就仅仅是一种实践的方便手段或有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目的一手段合理性行动变成具有伦理意义，亦即使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的事实认识对实践的价值判断发生影响，成为实践主体形成独立人格的依据；从而通过目的一手段合理性认识，使行动与道德责任相连，个体自觉地过着既是合理性的又是符合道德的诚实生活，以便应承日常生活的当